

我與國立中山大學

鄒韜奮

——國父創校六十周年紀念（本文另有圖照刊第六頁）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革命軍在廣州討龍（濟光）之役，家六叔參與其事，不幸失敗，我便隨他避難香港；待龍逆已除，返回廣州時，我年已十五，但是高等小學尚未畢業，我一面在叔父友人所辦的報館（采風報）做校對工作，一面準備投考國立廣東高等師範的附屬師範學校。翌年我以同等學力參加入學考試，得錄備取第六名，等了一個月後才補上正取生，從此發憤用功，第一學期考試成績幸名列第一。兩年後，我以一個高等師範附屬師範學校學生的身分，當選為全校（包括高等師範學校本部及附中、附師）學生會服務部部长，還負責學生會貿易部的工作。我在附屬師範學校讀了三年（當時學制規定連預科為五年），又以同等學力考進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國立中山大學的前身），仍繼續在學生會服務，創辦了廣州市第一所平民義學並主持學生會貿易部。在五四運動掀起熱潮的時期，貿易部供應及推銷各種新文化運動的書刊，成為新文化南方的推廣中心。

當時高師的校長是金曾澄先生，我在高師三年級的時候，鄒海濱先生才繼金先生為校長，其

後廣東高師奉命合併為廣東大學，海濱先生受命為廣大校長。鄒校長是中國國民黨的先進，他不但注意學生知識的傳授，而且重視學生革命思想和工作能力的培養。他時常送給學生們一些有關三民主義的書刊，我記得當時給我的第一本書，是戴季陶先生著的「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我的信奉三民主義和於民國十二年參加中國國民黨，固然是由於在高師期間閱讀一些有關國民革命的書刊，深受影響，同時也是受了鄒校長的薰陶和指導。

鄒校長對學生們的愛護輔導，真是關切備至。記得在民國十三年，正好我在高師畢業，鄒校長應日本文部省的邀請，選派一些學生到日本去考察，我是其中之一；我從日本考察回來，廣東高師已奉國父之命改組為國立廣東大學，鄒校長特別留下附屬小學的訓導主任一職要我擔任。當時這所附屬小學的主任，是在精衛的姪子汪宗提先生，平常他事情很忙，因此鄒校長要我多負些實際的責任。當時我建議就在附小創辦「學校市」，推行學生自治，他立即批准，做得很有成績。我在附小做了一年訓導主任，第二年附小

主任便出缺，鄒校長原想要我接替，我為着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堅辭不就。後來接受很多推薦，派了謝清同學負責。這位同學以後和我一同奉派到法國留學；但是他受了一位留德共產黨徒的引誘，參加了共產黨，還轉到俄國去，結果在莫斯科遊湖時落水身亡。我在附小服務時，繼續在廣大選修了一些有關教育的課程，一面教學，一面進修。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國父逝世，中央為紀念國父，於民國十五年九月，將國立廣東大學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當時廣州當局頗受共產黨的控制，鄒校長因堅決反共，被迫解職，便和林森先生北上；他們後來和一部分先進反共同志，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即所謂「西山會議」。但鄒校長在辭職前，還選派一位教授和十一位畢業生到法國里昂中大海外部去深造，我也是其中之一。因此我在中大服務一年多後，乃離校赴法。那位教授就是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的吳敬軒（康）教授。至於那十一位學生，今天在自由中國的只有我一個人了。

我們這一批留學生因為來自中山大學，負有黨的使命，而當時我國留法學生政治背景非常複雜

雜，除了共產黨的跨黨分子之外，黨內也派系紛歧，有的是擁護「西山會議派」的，有的是擁護汪精衛的「改組派」的，也有些是擁護中央的。海濱先生到法國遊歷時受了一些人的挑撥，對我曾有誤解；直至民國十八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我被駐法總支部推選為代表，返國參加會議，有機會和海濱先生暢談，誤會才得冰釋，後來他還迭次要我回校服務。

民國十九年我仍然是中山大學海外的學生，但從是年起，我接受日內瓦國際聯盟秘書廳聘在該廳工作。民國二十二年我休假回國結婚，晉謁海濱先生。此時他已重任中大校長，適值法學院院長出缺，他要我接任法學院教授兼院長；我當時答覆他說：我在國聯尚有很多未了的工作，必須回去處理，如果將來學校需要我回來，我一定隨時應命。果然我回日內瓦後的第二年（民國二十四年），鄉校長真的來電促我返國。這時，廣東的政局很不穩定，他自己的政治地位都有問題，所以很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回國。同時，國聯秘書廳的這一職位，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不僅是待遇優厚，而且是終身職；單以待遇來說，一個法學院院長的待遇，還不及國聯待遇的十分之一。但是我對這些從不去考慮，因為我是學校培植出來的，現在母校需要我去服務，我自是義不容辭，況且我在國內時曾對鄉校長作過承諾，我不能失信於愛護我的長者，所以我毫不躊躇的立刻辭去國聯的工作，返國就任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兼院長的職務。

當我決定接受母校聘約之後，本來還可以利

用國聯發給的旅費環遊世界後取道美國回國；但由於開學在即，我放棄了這一大好的機會，立刻束裝直接回國。這時我正是三十三歲的青年人，面臨這樣一個繁重的院長職務，自然又遭遇一個新的考驗。海濱先生是於民國二十一年重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當即決定石碑為新校址，建築新校舍，計畫周詳，規模遠大，準備把中山大學建成世界上偉大的學府。我回校服務時，第一期工程已經完成，第二期工程亦規模略備，並已決定將法學院遷入新建校舍。我從母校附屬師範起，讀到畢業，直到赴歐初期，還是母校海外部學生，現在能有機會回校服務並能參加建校工作，自然滿懷興奮，同時也自信能够順利地完成我的任務。

但我到校以後，慢慢地才知道我的處境是相當困難的。原來鄉校長打電報要我回來擔任法學院院長的時候，教務長蕭菊魂（冠英）就不大贊成，原因是中山大學的法學院向來是留學日本的所謂「留東派」的集中地，過去的院長和教授，大都是留日學生，蕭先生本人也是留日的，所以很不願意讓我一個留法的學生來接任這個院長。當時我在歐洲，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內幕，但由此更可看出校長對我的知遇。我由法國回到香港那天，校長特地派了一位教授劉克平兄專誠到香港接我。回到廣州後，校長又領我坐了他的汽車巡視全校一週，當天晚上就舉行了一個很盛大的宴會歡迎我。我當時對他的禮遇，只覺得非常感動而已，待到後來我遭遇到一些人事上的意外困難之後，才知道他這樣做是想用來提高我在大家心目

中的地位，以減少日後辦事的阻力。他這種提挈後進的苦心，以及處事的態度，真是使我慚愧，更使我敬佩！儘管校長如何為我着想，但是還沒有消除教務長對我的成見。我去法學院接事的時候，教務處並沒有派人陪我去，所以我是真正的一個人去接事的。當時不僅院中的教授已經聘定，職員也沒有空缺，秘書也是原任的。同時八位教授之中，就有四位是歷屆舊任院長。由於教務長的反對和資深教授的不甚合作，真使我感到困難重重。但是我毫不灰心，只是以誠懇的態度，專心致志的改進院務，這樣經過半年之後，幸而一切都有了改變。第一、大家都已了解我這個職務並不是自己鑽營得來；第二、我把全部時間和精神都放在學校裏，在認真、負責、誠懇的努力工作下，漸漸贏得了大家的了解，學生對我，尤表信仰和崇敬。

我在中大擔任法學院院長期間，遭遇的困難雖多，但也略有貢獻，有幾件事也許可以提一提：首先中山大學雖是廣東的最高學府之一，但法學院讀書風氣並不好。當時還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就是學校如果定在九月一日開學，學生們並不按時報到，有時一個月以後還有很多學生沒有到校註冊；我到校後第一件事，便決心改正這種風氣，索性把原來九月一日開學延至九月十五日，但是在九月十五日前學生必須一律到校註冊，開學後準時上課，不到的作無故曠課論，曠課超過規定，即予開除。這樣的辦法宣布後，我便嚴格執行，立即把這過去的歪風改正過來。

其次，我認為要培養讀書風氣，必須有設備

完善的圖書館，所以我用全力去充實法學院的圖書設備，增加各種圖書報刊，改善讀書環境，使學生在課餘的時候，樂於到圖書館去。同時為提高學生的讀書興趣和自動的研究精神，我還設立各項課外研究的組織，鼓勵員生共同討論，並舉行特約演講，設置模擬法庭、模擬議會等，使學習風氣日漸提高。

我在法學院無論處理什麼事務，必嚴格遵守規章，實行法治，絕無例外。我規定每天課後一小時，為與學生個別會談時間，聽取學生們的意見。我個人生活則以身作則，衣、食、住、行都注意力求儉樸，以為學生倡導。我所坐的汽車，也是全校最小的，被稱為「袖珍汽車」，以節省汽油。在衣的方面，我從到校之日起，即不穿西服，經常都穿着布質的中山裝和棉大衣，以提倡儉樸的風氣。為了提高學習風氣，我對法學院各系的課程，曾作過適度的調整，以求其更趨合理。為了提高學生的素質，我又在入學考試時，規定法律系錄取的學生，國文成績一定要在七十分以上，經濟系錄取的學生，英文成績一定要在六十分以上，政治系錄取的學生，歷史成績一定要在六十分以上，而且一定要依據考試成績錄取，絕不循情。為了提高經濟系學生的英文程度，我還規定由各年級的英文老師指定課本，考試時則請由其他學院的英文老師命題和口試。這些辦法實施以後，對提高學生程度，頗能收到實際效果。

在中大法學院院長任職期間，我花氣力最多的，還是「鄉村服務實驗區」的創辦。這實驗區的創辦是基於下列的需要：第一、由於當時學校

的校址在鄉間，青年學生課餘活動的範圍很小，我知道青年人旺盛的精力如果不讓他作正當的運用，就會朝着不正當的方向去發洩。第二、中山大學徵用了不少的民地，引起當地很多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對學校有一種敵視的態度，因此曾發生老百姓毆打教職員的情事，所以希望用服務工作去改善當地居民和學校間的關係。第三、我認為學術不能和現實社會脫節，尤其法學院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應以眼前的現實社會為對象，就是農學院、醫學院等，也該以當地人民為對象，邊學邊用，才能教學相長。

因此，我建議以學校所在地，石牌附近十鄉為範圍，設立「鄉村服務實驗區」，發動全校各學院學生自由參加。每鄉為一分區，每分區設青年學校一所，動員十六歲至二十六歲青年參加，予以自給、自衛、自治、自學的訓練。最初的「鄉村服務實驗區」計畫，是由教育研究所主任崔載陽先生和我草擬的，該區於民國二十五年四月起成立，起初是由馮節節先生任主任，我只任輔導委員兼顧問，不久又奉聘繼任主任。當時參加的學生非常踴躍，初期有一百七十人，後來又陸續增加。區內各村，每村以民衆夜校為中心，學農的教他們耕種畜牧，學醫的替他們看病和整理環境衛生，學工的教他們修理工具，學教育的教他們識字，還教他們怎樣去教別人。此外，還成立各項識字班、閱書報處、歌詠會、國術會等，並出版壁報和舉行各項康樂活動。起初鄉民們看見這些大學生到來，還保持懷疑和觀望的態度，後來便慢慢接近，踴躍參加各項活動，和大學生打成

一片，對學校的隔閡便大為消滅。後來學校每有慶典，他們都自動前來參加，並舉行各種民間遊藝節目來慶祝。這些大學生經過這種鄉村服務之後，對現實社會也有更深刻的了解，並且養成了服務熱情和社會工作能力，因此許多同學畢業後，對國家社會都很有貢獻。

雖然我在學校如此努力工作，並有些改革和成就；可是教務長蕭先生對我的成見卻一直沒有消除。到民國二十六年夏天，我任職將滿二年，他竟向校長「攤牌」，他表示如果下年度我仍任法學院院長，他便辭職不幹。他這一着，使校長深感困擾，因為他是校長一個最得力的助手，不能讓他離開的。我知道這種情形之後，為了不使校長為難，便向他提請辭職。他了解我的誠意和用心，也很懇切的對我表示，他祇得忍痛接受我的辭呈，但要我仍留任教務。我為了貫徹協助校長辦理教育的初衷，原也樂意接受；但同年七月抗戰爆發，由於宋子文先生的堅邀，在校長的同意下，便離開母校赴滬，轉往漢口，協助宋先生接收國際反侵略會中國分會。原來宋先生已接替邵力子擔任該分會會長，我便奉命接替杭立武先生擔任該分會的執行部主任，替宋先生負責實際責任，加強國際宣傳，推進反侵略工作。

在我到國際反侵略會中國分會服務後不久，曾蒙總裁召見，旋復奉命擔任軍事委員會設計委員及中國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委員。鄉校長對我說，他曾寫信給總裁推薦我擔任中大校長，因為後來我奉派返粵任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未能實現。我於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到曲江後不久，中大

外 中 誌 雜

便由激江遷返坪石，距曲江不遠，海濱先生要我就近幫助老校長金曾澄先生，仍和母校接觸頻繁。我的內子倫縉珊、堂弟彥徽都是中大畢業生，我的兩位女兒雪玫、雪馨都是中大附設幼稚園的學生，所以我的家人和中大也有密切的淵源。

中大自廣東高師改組為廣東大學以至國立中山大學，筆路藍縷，慘澹經營，改建擴充，成為我國第一流的最高學府，其成就不特為國人所讚譽，且蜚聲國際。自抗戰軍興，倭寇南侵，廣州淪陷，中大西遷雲南激江，二十九年秋復遷粵北

坪石等地；三十四年一月，敵軍進犯粵北，又緊急疏散至粵東梅縣等地，直至抗戰勝利，遷返廣州。三十八年五月共黨全面叛亂，十月廣州淪陷，中大乃陷於魔掌。

政府遷臺後，迭有在臺復校之議，五十三年，教育部曾成立重建籌備委員會，籌議重建而無成，至六十九年七月始在高雄西子灣復校。由於復校第一任校長現任教育部部長李煥兄的碩畫及熱心人士的贊助，現已頗具規模。可謂承先啓後，繼往開來。在中大歷任校長中，我最景仰的是鄒

編輯報告

編者

△本期提前十一月二十日出版時，適逢中國國民黨建黨九十周年紀念，我們一羣愛好文學歷史傳記掌故的朋友所辦的這一本純民營的期刊，為了表示誠摯的祝賀，特隆重刊出黎玉璽上將「豎立臺灣精神」、鄭彥棻教授「我與國立中山大學」、袁宙宗教授「風塵逸俠吳稚暉」，並選載「時代文摘」十一月號朱秉義博士創作稿「功在國家，利及世界——中國國民黨建黨九十周年評估」以供讀者參閱。

△讀者楊繼高先生來函

讀三十六卷五期范叔寒先生「儒將風流彭玉麟」大文，有數字「可能」為手民誤植者，列舉如次：1.一六頁下欄：「經」從戎，應為「經」字。2.而「破格」之「樊」，應為「樊」字。3.一七頁上欄：「斷難勝此」臣命，是「巨」字之誤。4.合「無」仰懇天恩，是「應」字之誤。5.同頁下欄（集句聯）：應是萬方多「難」此登臨。6.同頁上欄：豈敢復「惜」身家之圖，惜應是「為」字。7.同頁下欄黃鶴樓題聯「梅花」、「黃鶴」下逗號可省略。又辭官妙文中，我曾讀過一段，抄附供參考：「……臣素無室家之樂，安逸之志，治軍十餘年，未嘗營一瓦之覆，一畝之殖；受傷積勞，未嘗請一日之假，終年風濤矢石之中，未嘗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誠以親服未終，出從戎旅，既難免不孝之罪，豈敢為身家之圖，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關係風俗之盛衰，臣從戎志在滅賊也，賊已滅而不歸，近於貪位，長江既設有提鎮，責有攸司；臣猶在軍，近於戀棧，改易初心，貪戀權位，則前此辭官，疑於作偽，賢愚所同，軍事已終，仍不補行終制，涉於忘親，四者有一焉，皆足以傷風敗俗。夫天下之亂，不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退無義，伏維皇上中興大業，正宜扶樹名教，整肅紀綱，以振起人心……」（下略）

△本期稿擠又兼排校不及，浦薛鳳教授、周谷先生等的大作以及李昌來教授「我與海洋學院（三）」，莊政教授「孫中山先生的私生活（下）」均延至下期續刊，敬請讀者期待。

海濱、戴季陶、朱顯先三位校長，在老師中我最服膺的是黃貽霖，劉芙初、徐甘棠、黃希聲幾位老師。他們的艱辛締造和卓越領導，為國家社會造就了不少的傑出人才。我雖然是中大所培植出來的，而且畢業後也會在母校服務；但是貢獻至微，對前輩風範，心嚮往之而不能至。不過我對母校的熱愛，始終如一，所以我多年來一直極力贊成中大在臺復校。今年是中山大學成立六十周年，我覺得最值得我們注意和紀念的是：中大為紀念國父的唯一最高學府，亦為國父演講三民主義的聖地；國父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頒布手著建國大綱也是在中大。國父當年同時創辦黃埔軍校和中大，旨在培養國民革命的文、武幹部，所以十三年冬國父由粵北上時，曾在黃埔軍校操場召集兩校學生作告別訓話，以「文學生、武學生」相稱，期望至為殷切。在中大的優良傳統與成就中，最特出者，則為中大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及對三民主義服膺之誠篤。由於國父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之感召，中大師生受到深遠的影響，所以師生多為革命信徒，對革命奮鬥，勇往直前。而在抗戰期間，師生隨校三遷，絃歌不輟。抗戰勝利後，全國學潮洶湧，中大雖亦有共謀蠢動，終未得逞，亦為師生平日深受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薰陶的具體表現。我們以三民主義立國，當前的反共鬭爭也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鬭爭，我們必須發揚國父的思想和三民主義的精神，以三民主義來充實我們教育的內容和完成建國復國的大業，今後相信當益能發揚中大的傳統，以為國家盡最大最善的貢獻。